

# 历史变迁视角下昆明八景的动态适应性研究

## A Study on the Dynamic Adaptability of Kunming's Eight Scenic Spots from a Historical Change Perspective

魏雯\* 谢梓豪 余星

WEI Wen\* XIE Zihao YU Xing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昆明 650500)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and City Planning,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500)

文章编号: 1000-0283(2025)12-0096-06

DOI: 10. 12193 / j. laing. 2025. 12. 0096. 011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25-02-05

修回日期: 2025-06-20

### 摘要

城市八景系统性地整合了建筑、诗文、景观等诸多要素,是地方人文与自然景观的集中体现。选取明代—民国4个时期的昆明八景作为案例,梳理其历史演变过程,分析历代八景的格局变迁、功能转型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探讨城市更新对景观功能的影响及其产生的适应性调整。结果表明:(1)受夷汉文化交融与地理环境的影响,早期昆明八景呈现与经济生活紧密结合的特征;(2)以水景为主的部分八景在演变中展现出较强的传承性,但随着城市经济重心的转移,其格局发生了适应性变迁;(3)昆明八景的功能转型体现了从农业景观向商业地标转变的同时,也展现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扩展与城市发展的动态调整。通过对历代八景序列变化背后影响因素的梳理,探索在保护传统景观符号与推动城市发展之间实现平衡的路径。

### 关键词

城市八景;昆明;历史变迁;动态适应;演变

### Abstract

The Eight Scenic Spots of the city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 elements such as architecture, poetry, and landscape, serving as a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local culture and natural landscapes. The study selects the Eight Scenic Spots of Kunming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case studies. It examines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s among changes in patterns,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s, and urban development of the Eight Scenic Spots throughout history by tracing their historical evolution. It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urban renewal on landscape functions and the adaptive adjustments it cau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fluenced by the confluence of Yi and Han cultures as well as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 early Kunming Eight Scenic Spots displayed characteristics that were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economic life; (2) The eight water-dominated scenic spots have demonstrated strong historical continuity in their development, yet their spatial configuration has experienced adaptive changes coinciding with the shifting economic focus of the city; (3) The functional evolution of Kunming's Eight Scenic Spots reflects a transition from predominantly agricultural landscapes to commercial landmarks, alongside an expansion of urban public spaces and continuous urban development adjustments. By analyzing the factors that have influenced changes in the sequence of the "Eight Scenic Spots" over time, we explore strategies to balance the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landscape symbols with the promotion of urban growth.

### Keywords

Eight Scenic Spots of the city; Kunming; historical evolution; dynamic adaptation; evolution

### 魏雯

1982年生/女/甘肃兰州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地景规划与生态修复、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 谢梓豪

1999年生/男/陕西汉中/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地景规划与生态修复

### 余星

2002年生/女/云南曲靖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地景规划与生态修复

城市八景是对地方典型自然与文化景观的集称<sup>[1]</sup>,是源自于大量园林经典、诗词曲赋、民间传说、文人轶事等特色的文化<sup>[2]</sup>。

城市八景作为传统地域文化的核心载体,其本质是人与自然长期互动形成的动态适应景观符号,与城市变迁紧密相连。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滇池流域水岸带景观演变及其对生态安全的影响研究”(编号:51868028);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划”项目“基于生态修复理论的滇池入湖河道景观优化研究”(编号:KKRD202264104)

\*通信作者 (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35331892@qq.com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其地形以高山深谷为显著特征，地貌复杂多样，是多民族聚居和多元文化交流的典型区域<sup>[3]</sup>，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貌。昆明地区得益于其相对平坦的地势和丰富的湖泊资源，已成为全省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地带，同时也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明代以降，夷汉文化的交融促进了滇中地区文化多元性和独特性的发展，昆明八景即是汉文化与传统自然审美的有机融合<sup>[4]</sup>。在前人研究中，有学者围绕风景园林学会非遗大纲对八景文化的传承、特征及其重要价值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中国八景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理论框架<sup>[5]</sup>。针对八景保护与更新在理论研究上的不足，万敏等<sup>[6]</sup>以守正创新为视角，通过梳理历史与当代城市八景的保护与更新实践，提炼出顺势型保护、遗产体系支撑及保护性更新等核心经验。此外，王之羿等<sup>[7]</sup>通过对古籍文献的系统梳理与计量分析，以图示化方式呈现了八景的风景营建模式与意境，展现了以时态为特色的传统城市风景内涵。在云南八景的研究领域，宋胜豪<sup>[8]</sup>通过梳理明清时期云南八景的发展脉络，总结了其地域特征、时空分布规律及营造智慧。刘贞文<sup>[9]</sup>从昆明八景的起源与定型、与滇池变迁相关的景观、昆明城市发展影响的景观等方面，梳理了昆明八景的历史演变过程，揭示了其与地域自然、社会及文化发展的关联。然而，尽管已有研究在八景文化的传承、保护与更新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许多八景逐渐消失或功能退化，如何在城市更新中实现传统景观符号的活态传承，成为当前研究的难点。

作为自然与人文地理特征的缩影，八景的遴选过程深刻反映了城市动态变迁下经济与城市需求对景观功能的塑造与适应。传统保护模式往往将八景视为静态遗产，割裂于城市发展进程之外，导致保护与更新的对立<sup>[10]</sup>。如何在保护传统景观符号的同时，推动其与城市发展的有机融合，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研究通过探讨城市变迁语境下八景与城市发展的共生关系，旨在为高速发展的城市与传统景观符号系统的和谐共生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 1 研究区概况与方法

### 1.1 研究区概况

城镇的形成与发展往往需考量山地水系及复杂地貌对当地气候环境、布局结构、交通组织等产生的影响<sup>[11]</sup>。昆明地区具有“大山大水，平坝相嵌”<sup>[9]</sup>的地理特征，具体表现为：(1) 城市发展始终与滇池保持紧密联系，并逐渐向滇池靠近。历史上昆明城址位于滇池东岸，城池变迁大致呈现出自东向西，由南向北的发展趋势。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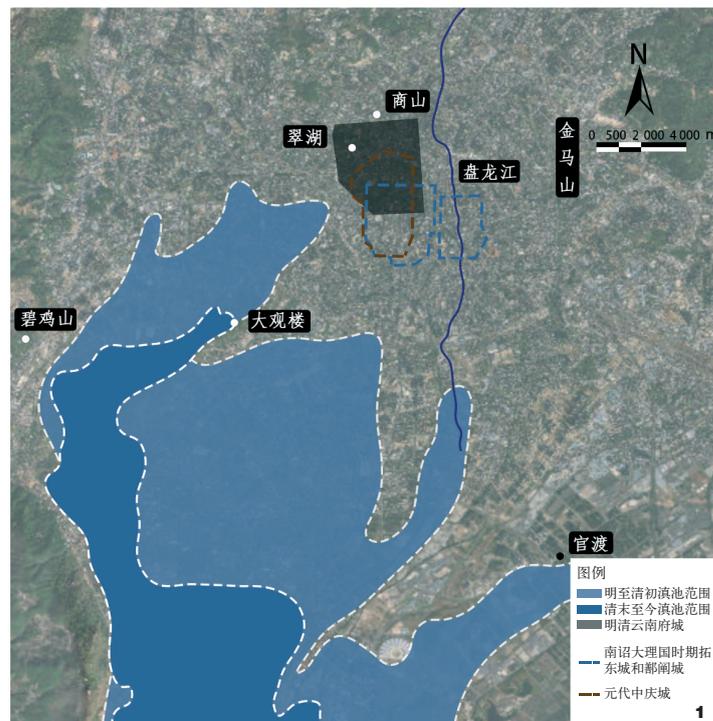


图1 明清云南府城与滇池  
Fig. 1 Yunnan Prefecture and Dianchi Lak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依托环绕的高山和平坦的湖滨地带，形成了稳定的“城—湖”关系。城镇分布在湖泊周边的平坝区，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呈现出山水交融的格局(图1)。(2) 夷汉文化交融的集中区域。自明清以来，中原汉文化逐步与滇中文化交融，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共生，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均展现出夷汉文化交融的特色。(3) 对河流资源高度依赖。城市建设多依赖于滇池及其河流，这些资源不仅为渔业、农业奠定了基础，同时为清代商业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明初至民国时期的昆明八景为研究对象。鉴于多数八景已不复存在，研究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方法，主要依据地方志文献中相关词赋的描述，结合历代昆明地方志、诗词、绘画等相关文献，系统梳理昆明八景的历史演变过程。通过对《道光昆明县志》《民国续修昆明县志》等地方志的详细解读，提取八景的景目、命名依据及其文化内涵，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还原不同历史时期的八景景观布局及其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以期更精确地复原其历史景观与文化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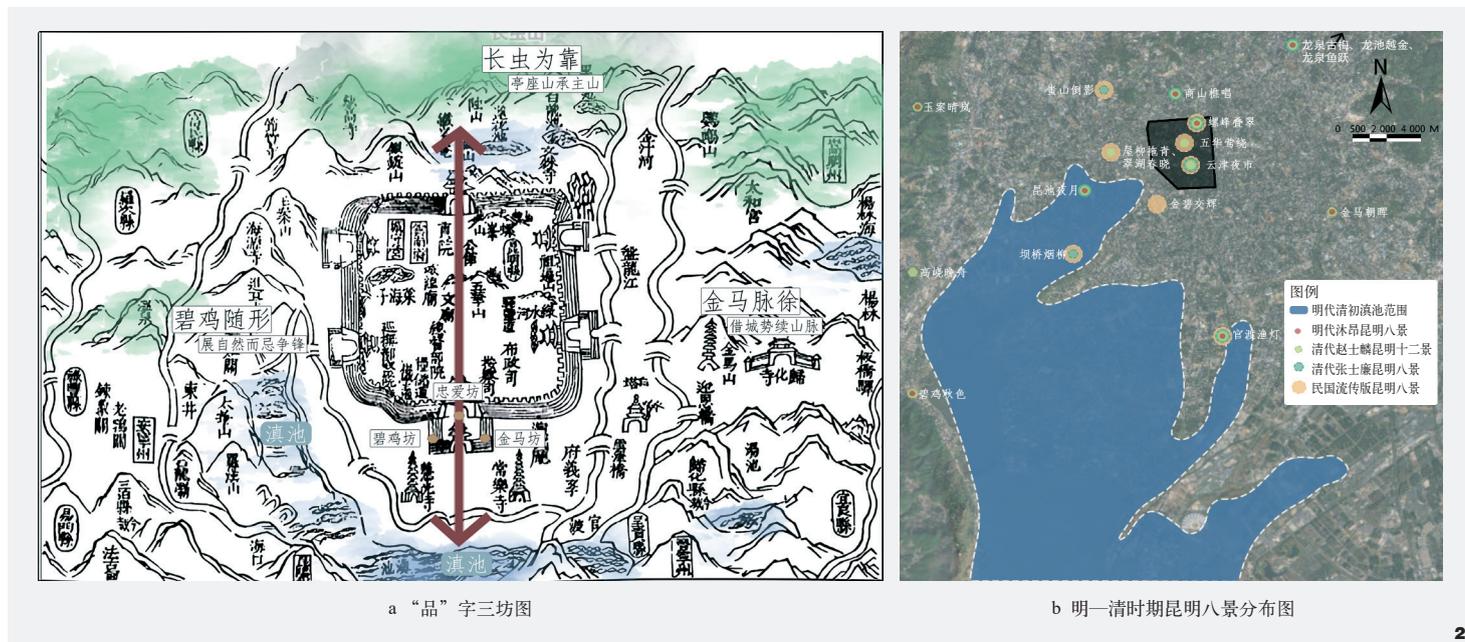


图2 “品”字三坊与金马、碧鸡山  
Fig. 2 The character “Pin” in Sanfang is associated with Jinma and Bijishan

## 2 昆明城市八景的特征

### 2.1 夷汉交融文化对昆明八景的影响

昆明地区在夷汉交融的发展进程中拥有悠久的历史，其记载可追溯至两汉时期。明初沐英平定南中后，汉民迁徙至滇地并启动了大规模的文化活动，同时引入了中原地区的教育、科举及礼仪制度。随着清代汉族在社会结构中主导地位的确立，夷汉交融呈现出汉族引入儒学、语言、礼教等先进文化元素的同时，亦保留了部分“夷化”特征<sup>[12]</sup>。此转型过程极大地推动了昆明地区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唤醒了当地居民的审美意识，并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塑造了具有独特审美特征的主体文化。

作为地方文化的具体体现，八景在云南的发展中产生了一定的自主性。例如夷汉交融的典型景观“金马碧鸡”。其代表的是昆明城东西两侧的金马山与碧鸡山。“金马碧鸡”

的传说可追溯至汉代。据《汉书·王褒传》记载，“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而《后汉书·西南夷传》则记述“青蛉县禺同山，有金马碧鸡，光景时时出现”，两山的神话色彩赋予了其独特的文化意象。自明代起，当地开始修建金马山神祠、碧鸡山神庙等宗教建筑。明代正式将“碧鸡秋色”与“金马朝晖”列为昆明八景。至民国时期，二者被合并为“金碧交辉”（图2）。清代，随着多民族文化的进一步交融，“金马碧鸡”的传说在诗文和八景描绘中频繁出现，象征汉文化与本土信仰、地区自然山水特征的深度融合。沐昂在“滇阳六景”诗《金马朝晖》中提到“遥忆汉家空望祭，今归盛代已多年”，赵士麟则在《碧鸡秋色》中有“翠岫昔传彩凤集，苍崖今见白云封”的描写，不仅赞颂了“金马碧鸡”的景色，也表达了在夷汉交融背景下中原王朝与云南边疆之间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联系<sup>[4]</sup>。

### 2.2 昆明八景的地域文化表达

通过对昆明地区八景的遴选过程进行考察，发现昆明八景呈现出相对自由开放的氛围。明清时期，统治阶级推行的右文政策加强了士大夫对国家事务的主体意识和自觉精神，倡导“与民同乐”，促使官员将城市八景作为彰显风土、教化民众的政治工具<sup>[13]</sup>，这对于相对落后的云南地区而言，无疑推动了八景文化的发展，这促使云南地区开发的八景发展进程与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高度一致<sup>[3]</sup>。同时，昆明八景的留存方式皆出自地方县志中的诗律词赋，这些文学作品在八景记载不足或相关资料未能保留的地区发挥了关键作用。许多诗赋成为记录八景的重要载体，这一过程更强调士人主导下的地方文化自发性与多样性。

因此，昆明自发形成的八景与中原地区相比，更倾向于选取具有原真性的生态美

学价值场所，同时展现出更高的自由性和独立性。加之昆明地区高原平湖及相对平坦的地势，使得早期部分昆明八景带有浓厚的渔樵耕读色彩，与经济生活紧密相连。直至清代，昆明逐渐完成了从农业到商业的经济转型，此时新生成的八景依托良好的自然景观，成为城市文化与商业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命名的组合上，昆明八景的命名经过谪人、宦士等的凝练，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个人审美倾向，但总体上仍以提炼山水形胜的核心特征为主(表1)。若将八景字意进行拆解，可以发现实际上是“形胜”意境的转化与筛选过程，以此来突显景观的特征。

通过对昆明历代八景的名称进行解构分析，统计其代表性关键字及其出现频次，并依据描述方式的不同，除去单独描绘，剩下的八景分为描绘农业生活和商业贸易两类(表2)。

结合相关研究发现<sup>[14-15]</sup>：昆明八景在明代、清代及民国时期的4次更迭中，共涵盖了36组景观。其中，渔(鱼)、樵等反映等间接描绘昆明城市生活状态的八景多出现在明、清初，并具有较为稳定的传承性，共有三组；描绘商业贸易为主的景观共4组，多集中在清中后期至民国时期。因此，昆明八景的形成与发展受其独特的地理格局和夷汉文化交融的影响，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

征，这些历史背景为昆明八景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格局变迁与功能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线索和文化语境。

### 3 昆明八景格局的适应性变迁

#### 3.1 昆明地区的经济转型

从元代中庆城向明清昆明府城的演进过程中，伴随着对海口河的疏浚与清淤作业，滇池北岸及东岸线逐步向内陆退缩，促进了土地的涸出，进而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sup>[6]</sup>。滇池岸线的变迁对城市格局的产生了深远影响，引起了人口重心由滇池东岸向城内迁移的趋势，城市发展方向亦随之由南向北转变<sup>[17]</sup>。同时得益于历代对水利的修缮和航运发展的重视<sup>[8]</sup>，明代通过“一年小修，三年大修”<sup>[9]</sup>的维护策略，对滇池北岸及六河流域的疏浚工程进行了持续的更新与修缮。清代进一步完善了这些水利设施，“省会附郭……皆藉六河之水以资灌溉”<sup>[20]</sup>，有效缓解了滇池水患，为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明清时期，昆明地区的经济转型与商业繁盛不仅得益于清代社会经商潮流的推动，更依托滇池地区便捷的航运网络，成功实现了从单一农业经济向多元化商业经济的转型。通过统计乾隆《云南通志》所记载的明代到清代的田赋农业税和鱼课、酒课等商业税(表3)对比情况可以看出，清代云南的农业税收虽然仍是主要税收来源，但商业税收的比例显著增加，表明了清代昆明经济结构经历了从以农业为主向商业和手工业转型。其中，结合相关文献发现，昆明作为滇池沿岸的重要城市，航运的发展对商业繁荣起到了关键作用<sup>[17]</sup>。滇池的水运网络连接了昆明与周边地区，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市场的扩展，产生了如云津、篆塘等优良渡口，其商业地位在航运发展中得到了显著提升。

表1 昆明八景统计  
Tab. 1 Statistics of the Eight Scenic Spots in Kunming

八景 Eight Scenic Spots	朝代与出处 Dynasty and origin	名称 Name
昆明八景	明代，沐昂、机先《昆明六景》诗	滇池夜月、碧鸡秋色、玉案晴岚、螺峰拥(积)翠、龙(鱼)池跃金、金马朝晖(阳)、官渡渔灯、商山樵唱
昆明十二景	清初，赵士麟《读书堂彩衣全集》	金马朝晖、碧鸡秋色、玉案晴岚、昆池夜月、商山樵唱、官渡渔灯、螺峰叠翠、柳屋拖青、云津夜市、高峽晚舟、五华莺绕、龙泉鱼跃
昆明八景	清中后期，张士廉《昆明八景图》	昆池夜月、云津夜市、螺峰叠翠、商山樵唱、龙泉古梅、官渡渔灯、坝桥烟柳、崑山倒影
昆明八景	民国，民间流传	五华莺绕、螺峰叠翠、翠湖春晓、崑山倒影、云津夜市、坝桥烟柳、官渡渔灯、金碧交辉

注：数据来源自道光《昆明县志》《民国续修昆明县志》。明代龙(鱼)池越金，赵士麟将其更名为龙泉鱼跃，张士廉更名为龙泉古梅；明代滇池夜月，清代更名为昆池月夜；民国时将屋柳拖青更名为翠湖春晓。民国将官渡渔灯改为官渡鱼灯，后文统称为官渡渔灯。五华莺绕称为五华莺绕，这里采用刘贞文《“昆明八景”与城市景观变迁研究》中的说法，统一成为五华莺绕。

表2 八景类型统计  
Tab. 2 Statistics of the Eight Scenic Spots types

类别 Category	名称与频次 Name and frequency	与水有关的元素 Elements related to water
描绘农业生活	官渡渔灯(4次)、商山樵唱(3次)、高峽晚舟(1次)	渔、樵、舟
描绘商业贸易	云津夜市(3次)、五华莺绕(2次)、翠湖春晓或屋柳拖青(2次)、金碧交辉(1次)	津、渡、湖

表3 明清时期昆明地区税收对比  
Tab. 3 Comparison of taxation in Kunming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税类型 Tax type	万历年间明代税额 Tax amount in the Ming Dynasty during Wanli period	康熙至雍正年间清代税额 Tax amoun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from Kangxi to Yongzheng	变化情况 Change situation
田赋总额	田赋总额：34 647 石	田赋总额：26 282 石	田赋总额减少约 24.1%
商税总额	商税总额：13 764 两	商税总额：14 801 两（原额）；至雍正七至十年新增税银：61 141 两	商税总额大幅增加；清代商税总额远超明代

注：数据引自参考文献[21]。

### 3.2 八景格局的演变

从明代到清代，伴随着城市、人口重心的北移，促进了昆明由单一的政治中心向集经济与商业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城市的转变。在明、清早期，居民多居住于城外。然而，清代各类衙署、工厂的产生促进了经济活力，常住人口逐渐向城内迁移，通过城市功能与人口分布的调整，城市重心逐渐向五华区域集中，人口与经济的内聚效应也直接推动了翠湖及其周边区域的开发与建设，新的八景应运而生。

通过统计发现，昆明八景中得以稳定传承的共有6组景观，分别是“滇（昆）池夜月”“坝桥烟柳”“云津夜市”“嵩山倒影”“官渡渔灯”“龙泉古梅”。这些景观的形成与延续均依托于良好的水系条件及其间持续的建设活动。而新增的八景，如“五华鹰绕”“翠湖春晓”“金马碧鸡”等，则多位于府城附近。明代将五华山与翠湖纳入昆明城后，逐步展开了对这两地的建设。沐氏将翠湖划为私园，清代逐渐开放并加强了其中的建设<sup>[6]</sup>，其北部的文林街逐渐形成了新兴的经济带。明代在五华山上修建了五华寺，史载“内有楼曰聚远，曰无边风景，曰旷怡竹悟……启以为滇人游燕之所”。由于历代增修，五华山上寺祠林立，清代位列八景。

### 3.3 八景的功能转型

昆明八景的功能转型是城市发展与经济

模式变迁的缩影。从明代到清代，八景的功能逐渐从以带有地方文化特征的农业风光为主的自然景观，转向了兼具自然与商业需求的城市公共空间。在明代，诸多八景以原始湖泊景观或渔业等生活为主题。例如，“斜阳争渡人声沸，薄暮开帆月影移”的“高峽晚舟”描绘了西山脚下滇池傍晚村落与舟楫活跃的景象；而“隔嶺烟云来牧笛，前村灯火引渔讴”的“商山樵唱”则刻画了烟云环绕的牧笛声与渔村灯火交相辉映的景致，从农业生产中传递出一种质朴的审美意境。这些景观以自然风光和农业生活为核心，代表了明代及其以前昆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

然而，随着清代昆明经济的转型，八景的功能逐渐发生了变化。以“云津夜市”为例，其形成与演变充分体现了昆明城经济发展与文化的交融。在元代，滇池流域的航运已较为发达，云津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昆明城西的战略要地。明初沐春铸大德桥并易名为云津桥，“以其当云南之要津，故名”。由于城市发展和功能转型，明清时期滇池地区的水路交通得到进一步疏通和拓展，促成了内外贸易的繁盛，也带动了周边城镇与村落的发展<sup>[22]</sup>，此时“云津夜市”已然是“房屋栉比云连，货物堆山塞海”。随着明清时期滇池地区水利工程的持续推进，云津桥更名为得胜桥并成为内外贸易的重要枢纽和昆明地区商业繁荣的核心。到了清代，依托良

好的水文条件，“云津夜市”逐步发展为地区性商业贸易的繁盛之地。相应地，云津桥功能开始转向以航运为基底商业贸易形式，以“云津夜市”为代表的码头经济景观，成为“千艘蚁聚、万舶蜂屯”的商贸枢纽。

与“云津夜市”的商业繁荣形成对比的是“官渡渔灯”的逐渐衰落。依据方国瑜教授的研究成果表明<sup>[23]</sup>，宋元时期官渡村靠近滇池，因其优美的自然风光被誉为“停舟烟舍”，并在明代跻身昆明八景之一，是为“官渡渔灯”。随着滇池岸线的逐渐内缩，官渡村失去了滇池东岸主要渡口的地位，作为八景基础的“渔樵”景象却逐步走向衰落。然而，根据雍正《云南通志》舆图（图3）和《昆明八景图》（图4）的分析，不难发现官渡地区仍具有一定规模的港湾条件，并保留了“渔樵”生活的方式。在官渡逐渐由传统渔村走向内陆城镇的形态转移过程中，传统的渔樵生活状态逐渐衰微。由于其经济生产方式与文化地位已经确立，加之众多文人墨客对“官渡渔灯”的诗文记述和缅怀，使得这种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延续至改革开放前，成为区域水资源利用和人文景观融合的象征。此外，清代的“翠湖春晓”则进一步体现了八景功能的转型。翠湖是潘家湾自然涸出的湖泊，明代即为沐氏私园，清代逐渐开放。此时翠湖景观上保留了自然风光的优美，还逐渐成为城市居民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与明代的“高峽

晚舟”和“商山樵唱”相比，“翠湖春晓”不再局限于农业生活的描绘，而是融入了更多的城市生活元素，至清后期成为昆明城市文化与商业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昆明八景不仅静态地展现了富有地方特色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从明代的农业风光到清代的商业繁荣，昆明八景的功能转型不仅见证了昆明城市经济的转型，也展现了城湖关系的动态适应与调整。

#### 4 结论

昆明八景作为城市传统文化与经济的符号与象征，其营建与演变过程体现了在夷汉文化融合背景下，作为公共景观的八景格局与功能为城市发展而作出的适应性改变。在昆明八景的演变过程中，八景的命名与分布反映了城市经济模式与空间结构的变迁。从明代的“高峤晚舟”“官渡渔灯”等农业景观，到清代的“云津夜市”“翠湖春晓”等商业与城市公共景观，八景的功能转型不仅见证了昆明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经济转型，也展现了城湖关系的动态适应与调整。这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为城市更新提供了重要的传统经验和解决思路。

然而，传统景观符号的保护与传承仍面临诸多挑战。以昆明八景中的水景观为例，尽管其在历史演变中保持了相对稳定的传承，但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部分水系被改造为暗河，导致八景乃至传统景观符号的传承出现了断裂。虽然部分八景如“云津夜市”因城市多元商业的发展，在当代以其他形式得以延续，但仍未恢复其应有的景观内核。如何塑造具有城市特色的新景观符号，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昆明作为云南省的经济重心，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却因传统景观系统保护的匮乏，导致其独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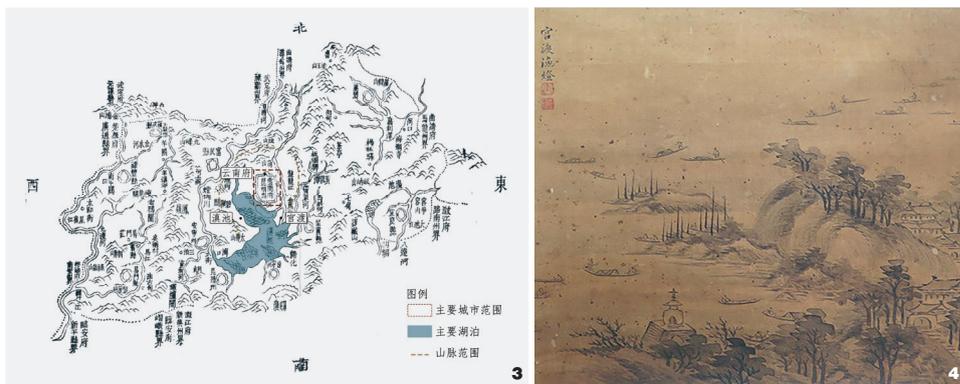


图3 昆明地区舆图  
Fig. 3 Map of Kunming area

图4 清张士廉“官渡渔灯”  
Fig. 4 Qing Dynasty Zhang Shilian's "Guandu Fishing Lantern"

文化魅力未能得到充分展现，逐渐沦为旅游“中转地”，而非深度文化旅游目的地。在新的城市发展语境下，传统景观元素需要进行新的适应性改变，以应对现代城市发展的需求。如何在保护传统景观符号的同时，推动其与城市发展的有机融合，将是未来城市更新中的重要课题。

注：图2改绘自康熙《云南府志》卷首，图3改绘自雍正《云南通志》卷之一，图4源自张士廉《昆明八景图》，其余图表由作者绘制。

#### 参考文献

- [1] 赵夏. 我国的“八景”传统及其文化意义[J]. 规划师, 2006(12): 89-91.
- [2] 耿欣, 李雄, 章俊华. 从中国“八景”看中国园林的文化意识[J]. 中国园林, 2009, 25(05): 34-39.
- [3] 周琼. 清代云南“八景”与生态环境变迁初探[J]. 清史研究, 2008(02): 64-73.
- [4] 周琼. “八景”文化的起源及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以云南“八景”文化为中心[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24(01): 106-115.
- [5] 万敏, 潘莹莹, 姚佳其, 等. 中国八景文化的潜在世界非遗特质阐释[J]. 中国园林, 2024, 40(04): 43-49.
- [6] 万敏, 潘莹莹, 姚佳其, 等. 数往知来、守正创新: 从江汉平原管窥中国城市八景的保护与更新[J]. 中国园林, 2024, 40(01): 54-60.
- [7] 王之羿, 黄婧, 万敏. 江汉平原清代城市八景文化赋存与时态特征[C]//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中国风景园林学会2022年会议论文集.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

与城市规划学院, 2023.

- [8] 宋胜豪. 明清云南八景营造智慧研究[D]. 昆明: 昆明理工大学, 2023.
- [9] 刘贞文. “昆明八景”与城市景观变迁研究[D]. 昆明: 云南大学, 2019.
- [10] 郑颖, 杨昌鸣. 城市历史景观的启示——从“历史城区保护”到“城市发展框架下的城市遗产保护”[J]. 城市建筑, 2012(08): 41-44.
- [11] 毛华松, 熊瑞迪, 陈心怡. 高山平川型城镇历史水系营建经验及其当今实践启示[J]. 风景园林, 2017(04): 114-121.
- [12] 廖国强. 清代云南少数民族之“汉化”与汉族之“夷化”[J]. 思想战线, 2015, 41(02): 113-119.
- [13] 毛华松, 廖健全. 城市八景的发展历程及其文化内核[J]. 风景园林, 2015(05): 118-122.
- [14] 朱惠荣. 昆明古城与滇池[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7.
- [15] 罗养儒. 纪我所知集[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8.
- [16] 杨奥, 魏雯, 谢梓豪. 基于城湖关系的昆明翠湖景观演变研究[J]. 园林, 2024, 41(04): 114-121.
- [17] 郭倬廷. 元明清时期滇池北岸水域变迁对昆明城扩改建的影响研究[D]. 昆明: 云南大学, 2023.
- [18] 路佳凡. 明清云南商人及其商贸活动研究[D]. 重庆: 西南大学, 2020.
- [19] 鄂尔泰. (乾隆)云南通志[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7.
- [20] 沈兰生. 六河图说跋[M].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4.
- [21] 鄂尔泰. (雍正)云南通志[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7.
- [22] 尹露曦. 云南滇池地区传统地域景观研究[D]. 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2021.
- [23] 方国瑜. 滇池水域的变迁[J]. 思想战线, 1979(01): 33-38.